

關於索善尼辛給蘇共首領的信

張潤梅

蘇俄作家索善尼辛於去年九月（被放逐前五個月），寫給蘇共首領的一封長信，今年三月在西方發表。其內容涉及範圍甚廣，對蘇俄當前之處境、政治理論、經濟建設、內政外交等等，都有所評論與建議。信中並一再強調俄國當放棄馬列主義，放棄「霸業」，專力建設內部。此信發表後極受重視。各方評論中，最值得注意的為蘇聯物理學家沙哈洛夫與歷史學家密德維捷夫之反應，此二人亦致力於爭取人權。三人目標相同，彼此相敬，但所主張方法各有不同。謹就索氏信件主旨、背景、及所得主要評論，試作探討，冀能有助於了解其世界觀。

原信長約一萬五千字，載明日期為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蘇共當局對之迄未置覆。作者於今年二月十三日被放逐後決定將此信公開，其俄文版由巴黎青年會出版社①於三月二日發行一本五十二頁的小冊；其英譯全文首由倫敦泰晤士報於三月三日刊載，並將由倫敦之「索引」季刊社②發行單冊。同時紐約時報亦於三月三日在第一版刊登此文內容與評論，並比較刪改前後之異同。其所受重視可見一般③。

原文分為八節④。於發表之前，作者略事修訂刪減，改為七節⑤。第一節節量蘇聯目前之國際處境，認為其地位已升高，超過已往帝俄時代任何階段之成就，歐洲各國總合力量仍不足與之抗衡。但索氏指出，俄人不必為此自傲，這種相對的升高，是由於西方國家與文化的衰退；而西方的衰退是由於歷史的原因，遠超過由於蘇聯的成就。並指出蘇俄造成的兩大錯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扶助了德國，第二次大戰後培植了毛澤東。作者認為這「問題關鍵不在軍事與外交估計錯誤，而在於我們奉行了馬列主義——在第一例中，是爲了打擊帝國主義；第二例中，是爲了要支持國外的共產運動。」目前雖然蘇聯聲威遠揚，可是人民真正得到了什麼好處？

第二節論中蘇共間戰爭之可能性。索氏認為如不設法制止，此種可能甚大。在無人敢輕易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下，戰爭一旦爆發，將會延續十至十五

年，而蘇俄傷亡人數可能高達六千萬之數。而所爭執之點却在於誰對馬列主義之解釋是正統！實則這些主義已是一套死理論（dead ideology），何不就讓中共以之自炫，負起它未實現的國際任務，去支援南方各地的暴動與游擊隊。「這套從西方吹來的『進步思想』已經害得我們够慘。現在它正向東移轉，讓它去吧，不要阻擋。（我並非希望中國遭到精神毀滅。我相信我們人民不久將由這病症中康復。假以時日，中國人也會康復。）」

第三節說明西方文化正陷於困境。俄國是西方之一部，亦同陷困境。所以目前談不到雙方如何達到「會合」（convergence）⑥，而是如何自困境中自救。依照 Teilhard de Chardin Society 和 Club of Rome 兩組織的科學家們用電腦的推算，預測如果照目前經濟迅速的成長與工業無限制的發展，到下一世紀將導致人類空前的災難。索氏認為西方不致走上毀滅之途，因為他們的文化具有高度機動性與創造性，一定能即時改革。「但是我們本身呢？……我們能够自救，但是自救的路上有個大障礙——就是那獨一無二的進步世界觀。」就是馬克斯在一八四八年所寫下的關於工業發展的話，「至今仍一筆一劃都不能更改」。

第四節中提出具體的建議——開發西伯利亞可解決經濟困境和擺脫中共威脅兩大困難。他認為幅原遼闊的東北（西伯利亞）從未充分利用，爲何不放棄「那套已死的理論，放棄那怪誕的世界任務」，終止其「霸業」，不僅對東歐諸國，就是蘇聯聯邦內各小共和國亦使之獨立發展，爲何不集中人力

物力來開發俄國本土內這片國民命脈的大好土地？索氏並表示對最近蘇聯與外國合作開發極為不贊稱：「正當世界感到資源缺乏之際，我們——一個工業超級大國——竟像最落後國家一樣，請外國人來開採我們的礦藏，並建議購買我們無價的寶藏。半代之後的子弟們將如何咒罵我們這輩敗家子。」

第五節講解內部發展之重要性與重要點，包括各方面之建設：除經濟需要之外，也論及生活方式、教育、婦女、家庭、精神、都市等等。仍以主張放棄馬列主義為改革之先決條件。比如在農產品方面，歷年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向為食糧輸出國。經過了五十年的新體制，其中四十年行施集體農場制，到現在倒必需輸入食糧了。索氏認為農業上唯一自救之道是放棄強迫集體農場制度，以自然的速率開發東北。酒為害人民精神甚大，但是它是國庫重要財源，便一任其為害。軍事的實際需要僅及所聲稱的十分之一；不必要的擴張及強迫兵役都可大幅縮減。教育方面未予以適當重視。對婦女所謂平等，不過是令她們操作與男人一樣的粗重工作。人民工作疲勞，難以養成閱讀習慣。總之在在都顯出財力不足，何以不縮減那用以虛張聲勢的軍費，而改進內部一切。「看看國內人民的精神和情緒，那些物質上的成就實在顯得微不足道了。」

第六節評判馬克斯主義。索氏稱它為「原始的、浮淺的經濟理論」。它「不僅不正確，不僅不是科學，不僅從未預測對過一件事……：它以半生不熟的經濟與機械概念來試圖解釋人這種最微妙的動物，甚至解釋那更為複雜的、兆億人們的綜合體——社會，着實令人驚訝！」作者歷數馬克斯理論在歷史中所造成的錯誤判斷、錯誤估計；它在蘇俄已成為當政者的重擔。它造成農場集體化、小商業國有化、軍事擴張、荒廢西伯利亞、妨礙工業與技術發展、宗教迫害。待國家遇到危難時——比如中蘇共戰事——俄國首領所依賴的將不是馬克斯主義，而是人民的愛國心。作者繼說，愛國心與馬克斯主義絕不相容。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就說過：「我們反對愛國者。」在一九二〇年代「愛國」一語等於反革命。索氏強調的說：「現在我寫這封信，就是要向你們提出愛國精神，也就是反馬克斯主義。」索氏將馬克斯主義喻為舞台上的道具，都是假的，處處謊言。也無須趨於另一極端，不必禁止這套過時的死理論，「只是不要以國家全部力量去支持它。」

第七節提出改革應行的途徑。索氏並不崇尚西方的民主，指出一些民主

政體下的混亂狀態。他認為自由固好，但須有範圍；秩序如果不行之過甚，就不致變成專橫暴政。他表示蘇聯的獨裁制度仍可繼續，但一定要剷除虐待人民的方法，如囚營、秘密審判等措施，並且要基於對人民的寬容和仁慈。他為文學藝術科學等等向當局籲請自由，以求求進步，並說治理國家需具有歷史眼光，不得照眼前需要而隨時轉移。

未修改前的原信稿，紐約時報獲得一份，但並未全部刊出，只提出幾點較重要之處。最大修改是刪去了題為「民主與獨裁」的一節，原排為第六節。按照紐約時報的比較，修訂後之語氣較為緩和。在原稿中作者認為西方民主最大缺點是缺少道德基礎，尤其認為美國已到了難以管理的地步。在修改後的文中，並未指出美國名字，但是提到每四年選舉時，政客們的爭奪、及法官判案受社會情緒影響，對竊取國防部文件的人竟宣判無罪等等實例。

美國發出的消息大都提及索氏發表此信前的修訂。專欄作家羅伯遜（Nan Robertson）⑦且提及索氏此信寫得頗為散漫，感情激動，一再加重語氣，顯出情緒焦急消沈。讀者如果回顧作者寫信當時的處境，這些現象並不意外。

索氏書寫此信時之處境極為艱險。去年蘇俄當局對外進行和緩磋商，對內則加緊控制。八、九月間正是一個搜捕持異見知識份子的高潮，而索氏也正是主要的一個對象。八月間兩名學者（Yakir與Krasin）⑧的審判，雖未對外公布內容，但根據各種事實跡象及事後對二人的減刑，觀察家們咸認為當局自二人中逼出若干供證，牽連頗廣。是否直接牽連索善尼，尚無從證實，但當時索氏尚未出版的「古拉格羣島」的稿件更成為秘密警察極欲獲得的「物證」。八月中索氏連接到恐嚇信件及電話。八月底代他保存稿件之一的一名婦女（伏洛尼安斯卡亞）便在列寧格勒被捕，經五日連續審訊後釋出，該婦女於回家後便自縊身亡。至此警察已獲得索氏文稿已成明顯事實，索氏所面臨的危機似乎也無從躲避。

八月二十八日作者在其莫斯科住所接見西方記者，透露他一再受到恐嚇，並表示如有意外發生，可知是秘密警察指使，因在蘇聯控制嚴密的情境下，無私人流氓集團敢滋事生非。至九月六日（該信寫出的次日）索氏又接見

記者，便透露了列寧格勒婦女被捕而後自殺之事。其於九月五日及五日以前寫信時之處境正是危機重重，仍能鎮定作稿，已屬難能。想來其構思行文或當遜於平日心境平靜之時。關於修訂中刪除一些對民主制度較嚴的批評，索氏本人未作解釋，讀者亦無從臆測；但就常識判斷，作者到自由世界後認為以前對民主之認識與今日之認識漸有不同，並非不可能。或者寫信當時，為表示自己態度，而言辭間有特別加重處。準備出版，再加以修訂，亦並無特殊之處。

要之索氏在草書此信時，身處危難之中，其對馬克斯列寧主義不加保留的批評，頗似我國專制時代的「死諫」。卽至將信件發表之時，作者本人雖已在西方，其家人却仍在莫斯科，亦是不顧安危的舉動。

索氏建議俄國終止其「霸業」，不僅對東歐共產國家，卽使對蘇聯聯邦內之各小共和國亦宜放手，使各自獨立發展，俄國則當集中力量建設內部。美國記者們由是用了 Nationalist 一字來形容索氏，有國家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兩種意義。索氏對此解釋並不同意。在三月底一次接見記者的談話中，他說出此點：

「蘇美兩國人士之間的互相了解甚為重要，但是如果相隔甚遠，而欲建立了解更加困難。因為距離，報章的判斷難免根據表面，未經足夠考慮。這裏就有一個例子。我給蘇維埃領袖的信，甚至在它未在美國發表前，就在報章中（從紐約時報開始）浮淺甚至錯誤的解釋，與它的真義相反。我在此信中所寫的計劃，原是由那種普通信念推論出來，不論是國家還是人民唯有在本身自動的加以自我約束，完全集中於內在的發展，才能達到他們最高的精神滿足。基於這種原因，我才建議我國，應當自動放棄在國外所征服的和對遠近的國外地區所施的暴力，以及軍備競賽。我建議這些應大規模進行……美報竟將之解釋為國家主義，那是尚武的國家擴張……這樣報紙將增加這個地球上距離較遠部份之間的不了解，而不是互相了解。」^⑨

這番話雖然是對解釋美報的誤解而發，但是也簡明的說出索氏許多建議是基於對作者的常識與經驗，就是凡事求諸己，要求內在的發展。這也近似我國「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的順序與精神。

三

索氏此信發表後，許多人將之與蘇俄物理學家沙哈洛夫於一九六八年所發表的言論^⑩相比。二人主要異點頗多。沙氏主張與西方尤其是美國合作，實行民主，技術與建設要現代化；索氏則要在俄國本身內部找自救方法。沙氏對於索善尼辛的建議信，作了一篇長達四千字的分析與評論^⑪，提出數點反對意見。首先反對索氏主張保留獨裁，但以道德為基礎的觀點。沙氏說，「過去俄國歷代的奴隸精神並不是幸福，而是最大的不幸。我認為民主的途徑是唯一有益於任何國家發展的方法。」

對於索氏建議放棄馬克斯主義一點，沙氏說「這是出於索氏不了解現代強權政治。蘇維埃社會的一個最主要特徵正是它漠視思想理論。」關於索氏建議俄國依照本身傳統發展，而無須注意西方政治、工業、科學的進展，沙氏反對這種拒絕西方影響而自我孤立的主張。並認為他這種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式的信念有潛伏的危險性：「索善尼辛的思想，帶有宗教色彩及家長姿態的浪漫主義性質，我相信，在現實中這種國家主義及孤立主義的方向會導致許多錯誤，使他的建議成為烏托邦，並且有潛在的危險。」^⑫「他欲以簡單的技術去開發西伯利亞似乎全不可能，在東北地區困難甚多，這注定要失敗。」^⑬關於索氏曾提及民主之缺點，沙氏指出這種說法易於造成人們對它的恐懼。「只有在民主條件下，一個民族才能發展並適應於極其複雜的世界上，有意義的生存。」但是沙氏對索氏的精神和他為爭取人類尊嚴而在這個悲慘世界上奮鬥的努力，感到敬佩，稱他為「奮鬥的巨人」。^⑭

另一位值得注意的評論者是蘇俄的歷史學家R·密德維捷夫。稍早在索氏初被放逐後，密氏即說，這次放逐不能算索氏的勝利，因為他離開了自己，他們本國的改革，密氏認為「最實際的方法是逐漸的緩慢的演化變遷，由提高生活水準來促成它。蘇維埃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都寄於科學與技術及經濟的發展」，他並相信這些可由西方供給^⑮。有這些觀點，他自然也不會同意索善尼辛的建議。

密氏認為索氏的主張孤立與批評西方民主體制是開倒車。他不同意沙哈洛夫主張以外來壓力促使蘇共當局趨向民主，像美國議員傑克遜所提的最

惠國條款修正案，用以要求蘇聯放寬以色列移民。密氏以為壓力太大恐會生出相反效果。因為他曾批評沙氏與索氏二人觀點，遂受到自由人士指摘，以為造成太多紛歧意見，恐使自由人士自己陣營內再分裂。密氏的答覆深具民主精神：「如果針對衛護人權問題，我們這些人自當團結一致。但是在尋求真理時，我們不能給自己一夥人中立下檢查先例。真理只有在意見抵觸中、辯論中才能產生。」¹⁰

索普尼辛這封信，不能作為文學作品來看。它直接而較完整的傳達出作者的世界觀。索氏在所提出許多對國家改革與建設的主張中，顯出他保守的傾向，重視傳統，和接近宗教的觀念。他主張放棄向外擴張，而致力內部建設，放棄軍備競賽，而從事國內資源的開發，放棄怪誕的馬列主義，而保留天然的愛國心，放棄瘋狂的發展工業，而以自然的進度推進工業及農業，他不願接受外人的協助來開發資源，而寧願靠自己力量。這些主張就自然將他自己標了類：有孤立傾向的國家主義者，帶有宗教色彩的保守主義者。索氏所提出的具體救國建議中，確有偏於理想主義之處，未必全切合實際。但是由此却現出他對國家的熱愛，對改善普通人民生活的殷切，對一般社會問題的嚴肅認真的態度。這些態度是與他在以前小說中所表顯出，對人類不幸、所抱深切的同情與關懷是一致的。也同樣令人對作者肅然起敬。

美專欄作家雷諾爾¹¹將索普尼辛與沙哈洛夫併稱為「兩位俄國的先知」。他認為索氏的保守傾向，傳統色彩，宗教氣氛可能較沙氏的現代派更易於被俄國青年知識份子所接收，影響更為深入。沙氏的影響自然也存在，或者稍後期間更能發揮作用。在蘇聯嚴格控制下的青年很可能更需要找尋一種信仰，一種精神的憑藉，與傳統的連繫。欲使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與過去根源完全切斷是很難做到的。索普尼辛的保守世界觀正適合了傳統的象徵。他的影響能深入青年能深入民間，也正是為蘇共所不能抹煞的。

註解

① YMCA PRESS 即發行索普尼辛「古拉格羣島」俄文版之出版社。

② 「索引」季刊原名 Index on Censorship，為 Writers and Scholars International 所辦之刊物。此一國際作者與學者組織專為爭取文人藝術家之自由，為無黨無派、非營利機構。見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七四、三月三

關於索普尼辛給蘇共首領的信

日。

- ③ 台北中央日報於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分五次連載該信摘要。
- ④ 紐約時報，一九七四、三月三日，第一及廿六頁。
- ⑤ 以下七節內容摘要，根據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七四、三月三日。
- ⑥ 東西雙方的「會合」，為蘇俄物理學家沙哈洛夫的主張。
- ⑦ 紐約時報，一九七四、三月三日，第二十六頁。
- ⑧ Pyotr Yakir 五十歲，為一歷史學者，一九七二年六月因地下出版事被捕。Viktor Krassin 四十四歲，經濟學者，一九七二年九月被捕，同一罪名。九月一日各判三年徒刑。數日後官方安排令二人在記者會上再自行供出罪狀。數月後二人都減刑。
- ⑨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四月二日，第一一二頁。
- ⑩ 沙哈洛夫的“Progress,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 ⑪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四月十五日，第一一二頁。
- ⑫ 同上。
- ⑬ 同上。
- ⑭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三月五日，第二頁。
- ⑮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四月廿九日，第五頁。
- ⑯ 中國新聞（英文報），台北，一九七四、四月三十日。
- ⑰ Max Lerner, “Two Russian Prophets”, The Japan Times, May 15, 1974, p. 12.

鄧公玄著：

政治藝術論
（人文庫）
人生價值論

重版了！

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